



图1 故宫博物院藏“陆绩怀橘”砖雕



图2 山西屯留宋村墓“陆绩怀橘”壁画



图3 洛阳洛龙区关林庙宋墓“陆绩怀橘”砖雕

■ 鉴赏交流

出土文物中的“陆绩怀橘”形象浅析

祁姿妤

宋辽金时期,中原地区流行仿木构砖雕壁画墓,墓葬装饰常见“二十四孝”题材,“陆绩怀橘”是其中的著名一。《三国志·吴书·陆绩传》中记有“陆绩怀橘”典故。东汉末年,六岁的陆绩在九江拜见袁术。袁术让人招待他吃橘子,陆绩偷偷在怀里藏了三个。临走时,陆绩弯腰告辞袁术,橘子掉落在地上。袁术问:“陆绩,你是来做客的,怀里怎么藏着橘子?”陆绩跪在地上,回答道:“这是我留给母亲吃的。”袁术深感陆绩与众不同,以后必成大器。

《三国志》记载陆绩出身世家大族,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概览,曾作《浑天图》,注《易经》,撰写《太玄经注》。陆绩虽才学卓然,但在三十二岁时英年早逝,其最为后世所知的便是这段童年孝行故事。

隋唐时期,陆绩怀橘的典故开始通过史书与类书广泛流传,流行范围超出了江南地域。怀橘故事作为类书资料,分别以“孝”和“瓜果”词条录于《初学记》中,与“殷挥持瓜”是成对典故。随着“陆绩怀橘”进一步传播,陆绩形象逐渐扁平化,其中“孝”的含义被不断强调放大,最终进入“二十四孝”中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后世围绕这一典故塑造出各种各样的艺术造型与衍生文本。相关的名人胜迹、墓室图像、历史文献、小说话本等展现的都是“孝子”陆绩的人物形象,这一过程也折射着佛教中国化、儒学复兴的文化进程。

在陆绩当过太守的郁林郡(今广西玉林)，“陆绩怀橘”的典故被用来塑造井、社稷坛、街区、山城等。吴国时期陆绩被孙权派往郁林郡任太守,当时这里环境恶劣,陆绩开展了初步的治理和防疫,去世后也葬在这里。南齐判官刘博士古陆绩怀橘孝母之孝道,在井边栽橘一株,称“陆公井”“橘井”,当地居民直接将此井叫作“怀橘井”,将此地命名为“怀橘坊”。直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任贵县知县的蒋航还将布山故城一带定为“橘井名区”,至今牌楼尚存。

宋辽金时期,中原地区有大量墓室壁画,雕砖表现陆绩怀橘的典故。中原地区自汉代以来就有表现孝子故事的传统,而直到宋元时期,才在这一地区看到陆绩怀橘的题材,这从侧面佐证了陆绩怀橘故事是后来逐步进入二十四孝故事之中的。陆绩怀橘故事最开始与二十四孝故事合流并非由于文献的合流,而是始于宋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中的孝子题材合流。

据王玉楼在《汉魏六朝孝子传研究》中的统计,从三国到西晋流传的诸多孝子故事中并没有陆绩。而将孝子故事提炼为“二十四孝”,最早很可能产生于佛教系统。《故园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中言道:“日连已教育提母,我佛肩异净悲王。万代史书歌舜主,千年人日赞王祥。慈鸟返哺犹怀感,鸿雁离飞便使行。郭巨愿埋亲子息,老莱欢着彩衣裳。最难难感漫衷息,不易轻欺对上苍。泣竹笋生名最重,卧冰鱼跃义难量。”这是至今可见的最早的佛教文献记录,提及释迦、目连、舜、王祥、郭巨、老莱子、孟宗、黄香八人。这些故事有的从东汉就开始流传,有的涉及感应现象,也有很多与佛教背景有关,但其中并未包含陆绩。

目前已在19座纪年明确的墓葬中发现了与“陆绩怀橘”相关的壁画或雕塑,其中两宋时期的12座、金代5座、蒙元2座。孝子故事在进入人到地下墓葬之前有鲜明的佛教背景,是佛教渗入中国日常生活与丧葬观念的重要表现。宋代儒学复兴,南宋时期朱熹注意到了佛教结合孝道形成的广泛影响,并且意识到了需要利用这些佛教孝子故事进行再度整合,去佛教化,以加强儒学正统。朱熹谓“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



图4 甘肃清水县白沙乡箭峡村墓“陆绩怀橘”砖雕



图5 山西沁县西林东庄金墓“陆绩怀橘”砖雕

解读黎族头巾

赵家彪

黎族服饰包括上衣、筒裙、头巾、胸饰、骨簪等物件。文献记录黎族服饰由来已久,据《尚书·禹贡》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汉书·地理志》载:“民皆布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本文以海南省民族博物馆(下称海南民博)黎族妇女头巾(下称黎族头巾)藏品和专题调研中的绣字头巾为研究对象,从其图案纹样特征、审美价值等不同的层面进行解读,旨在加深对黎锦文化的探究,希望得到各方专家学者指正。

黎族因生活地区、习俗、服饰等差异,被划分为哈、杞、润、美孚、赛五个方言区。从五个方言区妇女头巾的分类看,哈方言、杞方言、赛方言、美孚方言都有缠带、装饰头巾的习俗,而润方言妇女则有使用骨簪固定头发的习惯。黎族头巾按图案形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图案纹样没有文字的头巾,另一种是既有图案纹样又有文字的绣字头巾。形式多样的黎族头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方言特征、审美价值。

黎族头巾图案

从海南民博馆藏黎族头巾图案纹样看,图案内容丰富,纹样造型生动,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图案是在实用美术、装饰美术、建筑美术等方面,关于形式、色彩、结构的预先设计。在工艺材料、用途、经济、生产等条件下,制成图样,装饰纹样等方案的统称。”(雷圭元:《图案基础》,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7页)

图案内容特征

黎族头巾图案内容特征基于黎锦织绣图案的多样性,有人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万字纹、汉字纹等图案纹样。以海南民博藏品为例,同样是黎族头巾,哈方言妇女头巾以黑色或深蓝色为底,棉线织造而成,或绣有粉色、褐色的动植物纹、几何纹等纹样;或以无数白色、褐色的动物纹组成几何图案,饰有流苏。杞方言女子头巾以深黑色为底,棉线织造而成,绣有红色、白色、黄色的鱼纹、万字纹、几何纹等图案,饰有流苏(图1)。润方言女子头巾以棉线织造双面绣而成,两端绣有黑白双色的人纹、花卉纹、几何纹等纹样,饰有流苏。赛方言妇女头巾由黑色棉线织造而成,两端绣有黄色菱形纹、动物纹等装饰纹样,饰有流苏。美孚方言女子头巾由黑色或深蓝色棉线织造而成,头巾主体图案或以蓝黑、黑白长条形相间为主;或两端绣有黄、白色汉字及几何装饰纹样,饰有流苏;或头巾中央织绣汉字,两端织绣精美的民族花纹图案,这类绣字头巾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黎族头巾图案纹样在某些方面作为一种浓缩了黎族服饰视觉表现的图案类别,具有直观性、形象性、指示性的特征。比如杞方言头巾图案纹样以人纹、鱼纹、万字纹、几何纹、水波纹为主,看见黎族妇女的头巾,服装有这些图案纹样,特征,即可直观辨别出是黎族杞方言妇女,杞方言头巾中的鱼纹蕴含年年有余之意。黎族头巾图案上万字纹,其纹样最早是佛教的图案,也是一个象征吉祥的图案。万字纹是一种外来文化影响且特色明显的装饰纹样,“从宋代起源,明清流行后,就一直沿用这种外来的宗教符号标志,作为织锦艺术装饰上的主题花纹图案。”(王海青:《黎族织锦图谱》,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第82页)在黎族各大方言区织锦的图案纹样上,特别是在杞方言头巾图案纹样中,直线组成的万字纹二方连续图

一切一切为国家

——新见徐新六函考释

程存浩

近日我在阅读《胡适全集》时,读到胡适与丁文江、徐新六关系特别友好的相关记载,令人感动。胡适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坦言,“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这人去世了,一个最可爱的人!”此人就是徐新六(1890~1938)。

多年来,我一直在精心整理罗原觉学人罗原觉的往来信函,意外地发现《徐新六致罗原觉函》一封,令人欣喜若狂。该函共有两页信纸,款式尺寸一致,每页横15.3厘米,纵23.4厘米,有文字14行。为保持信函原貌,每行结束时,以“/”为标识,现释文如下:

原觉仁兄先生:/从者来都,得靛/丰采,惜弟行色匆匆,未克多暇常叙,殊为/耿耿,遂奉/手示并端一方。/君子之盼,敢不拜嘉,惟过于隆重,殊不敢当,祇以/拳拳之情,溢于言表,权当领受,容候后/报。弟至英,必见鼎甫兄,当以/近状告之。我/公何日出都,以后通讯可寄何处,还乞/示知,倘蒙草履,幸/恕其率,敬请/台安。弟徐新六顿首。一月二十三日。/

该函未署年份,只留下“一月二十三日”。信中明确写明写信人是徐新六,收信人是“原觉”即罗原觉。徐新六,字振飞,祖籍浙江余杭,1890年出生于杭州,曾留学英法等国,学习冶金、经济、国家财政等专业;1917年夏任财政总长梁启超秘书;1918年12月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被委任为巴黎和会赔款委员会中国代表和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

信中提及的“从者来都”“我公何日出都”之“都”,应指北京。表明此时徐新六正在北京工作。据《民国人物大辞典》“徐新六”条目介绍,“1914年回国,经高等文官考试录取,以第一名授上士,分发北京政府财政部任金事,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1917年夏,任财政总长

案的规则,逐步构成杞方言妇女头巾符号文化特有的表现形式。

图案形式特征

黎族头巾按图案纹样形式类型区分,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图案纹样没有文字,另一种既有图案纹样又有文字。相比之下,后者更具有文化内涵和研究价值。黎族头巾规格一般长约50厘米至200厘米,宽约20厘米至45厘米不等。色彩多为黑、红、黄、绿、白五种颜色。以黎族杞方言头巾为例,巧妙地将五种颜色相互搭配,织绣成特定意义的点线、块、格、角、波、条等“五彩斑斓”图案纹样。如图1-2所示,图案花纹上万字纹,经过巧妙的组合相互伸展,演变成多个连续的万字形图案,象征着吉祥、平安、长寿的理念。黎族把宗教的万字形符号吸纳在本民族织锦品上,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具体表现。

精美的绣字头巾

绣字头巾的内容特征

黎族的绣字头巾多见于美孚方言(图2)、哈方言和杞方言,而润方言和赛方言较为少见。据《海南黎族传统工艺》所载:明清时期“居住于海南岛西部的黎族美孚方言,其头巾和筒裙上开始引入汉字做图案。”绣字头巾作为黎族织锦文化遗产的一种形态,具有鲜明的审美价值。每件绣字头巾的文字内容、书法形式、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黎族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本民族文字,历史上,在海南岛西部汉、黎族杂居的地区,由于美孚方言与汉族经济文化交往密切,不少黎族美孚方言百姓都能说汉语(海南方言),熟练使用汉字。精心织绣的绣字头巾可谓是百年前黎族美孚方言百姓留下的黎汉文化交融的历史遗存。需要说明的是,以海南民博黎锦藏品为例,在一些黎锦中也能够看到“囍”“寿”“福”等汉字。可见黎族妇女善于将织绣品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汉字的符号化和象征性为黎族织锦图案增加了新的元素,并在薪火相传中被逐步融合,这体现了民族文化间的相互融合。

美孚方言绣字头巾,集黎族织锦技艺、诗词格言、书法艺术、母训家教于一体,是美孚方言妇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美孚方言早期绣字头巾,使用了黎族传统的纺、染、织、绣技艺,用海岛棉经压籽机去籽,脚踏纺机纺线或手捻线、绕线,采用植物、矿物染色,用踞腰织机织造有植物纹、动物纹、几何纹、水波纹等图案纹样的半成品。有女定亲或出嫁作嫁妆用时,由父母确认诗词、格言、训教内容,酬请村里或村外的文墨之人题写内容,然后按照字体规格一针一线织绣完成。绣字头巾不与上衣、筒裙组成一套完整的服饰,而且承载着亲人无声的训教与祈福。

绣字头巾的审美价值

绣字头巾是美孚方言妇女生活实践中实用与审美的统一。以海南民博藏品绣字头巾为例,织绣品年代多在清代晚期至民国初期,颜色大多为黑色、深蓝色,也有红色、黄色,绣字内容来看,类似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赋、比、兴手法在其绣字头巾中运用得普遍,语言形象、比喻生动,使得绣字头巾的内涵丰富多彩,有礼义廉耻道德观、男耕女织的劳动价值观、崇尚诚信尊礼等内容。

2020年5月,笔者在专题文物摸底调研中

了解到,民间收藏黎族传统绣字头巾多为清代与民国时期美孚方言绣字头巾,其长约50至190厘米,宽约为20至30厘米不等。解读有些绣字头巾上的格言家训字义并非易事,有些错字、别字、草字难以辨别,要有一定的书法功底,在熟悉文字的基础上理解其含义,才能朗读出来。以图3的绣字头巾为例,头巾中央绣上鸟纹,鸟纹的四周绣字,其内容为:“巧出奇花朵朵红,专贞四德三从;有德才有贞节,似龙似凤似牡丹。”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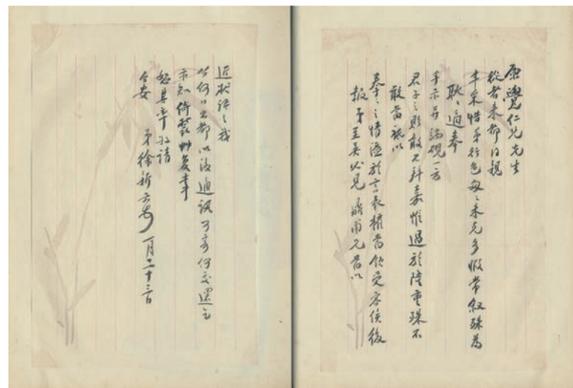
图4为例,图中绣字内容为:“闺门何所事,巧绣百花枝。四德龙凤耀,书贤圣表中。”“天地清宁兮,淑女负性奇。非无怀春日,吉士岂诱之。”

美孚方言绣字头巾上的诗词、格言种类繁多,很多是对偶句,有五言、七言、十言诗等,书法关系也有多样。美孚妇女通过把审美、愿望、交流思想的语言有意识地织绣在头巾上,形成了传情达意与审美的有机融合。

黎族头巾的时代价值

黎族头巾体现了黎族人民的生活情感态度,细心品读和鉴赏黎族头巾,特别是绣字头巾上的诗词、格言、字里行间所浮现的历史文化,能感受到隐藏的、真、善、美内涵。对于民族博物馆而言,要充分发挥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等职能,加强对黎族头巾古往今来的时代空间,以更加符合现代审美的形式,奉献多元化、趣味化的文化盛宴,让黎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焕发新时代活力。

综上所述,黎族头巾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对黎族头巾做系统性、原真性记录整理,从工艺传承方式、演变规律以及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上做审美性、多样性的探究,可以有效揭示黎族头巾同服饰图案纹样在文化寓意上的关联性,从而进一步阐释黎族头巾纹样的构成与表现形式,营造活态传承、活态保护的良好氛围,使黎族织锦文化和传统手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更好的延续和发展。



徐新六致罗原觉函

湖金沙港吴姓的庄子。我不愿南下,后来只好把庄子退了。”

1938年夏,国民政府计划派一代表团赴美国争取美援,内定徐新六为首席代表;8月24日,徐新六由香港应电召乘飞机赴渝,途中为日机截击遇难。当胡适从伦敦前往瑞士参加国际史学会途中获悉徐新六遇难时,异常悲痛。他在1938年8月27日致妻子江冬秀信中写道:“我这几天(廿五、廿六、廿七)真不好过。自从志摩死后,在君、新六相继而去,真使人感觉孤凄寂寞……我最敬爱的朋友之中,在君、新六为最相投,不料这两个最可爱的朋友偏偏先死了!”(《胡适全集》第24卷)1938年9月24日,胡适再次致函妻子:“‘有一日力,尽一日力’,‘一切一切为国家’我们不要忘了他的遗训!”(《胡适全集》第24卷)

徐新六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举足轻重,与诸多名人交往颇深,见证参与了许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其“一切一切为国家”的爱国情怀令人感动钦佩。此次新发现的《徐新六致罗原觉函》,是难得的手稿遗物,对加深徐新六研究、丰富徐新六人格提供了新材料。